

国学新读本

尚 书

姜建设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学新读本

尚 书

姜建设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尚书/姜建设注说.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3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7-81091-756-8

I. 尚… II. 姜… III. ①中国—古代史—商周时代
②尚书—注释 IV. 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3435 号

责任编辑 靳宇峰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250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23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

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地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

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 (1)
《尚书》通说	(1)
尧典	(125)
皋陶谟	(139)
禹贡	(147)
甘誓	(162)
汤誓	(164)
盘庚	(166)
高宗彤日	(176)
西伯戡黎	(178)
微子	(180)
牧誓	(183)
洪范	(186)
金縢	(196)
大诰	(200)
康诰	(207)

酒诰	(216)
梓材	(222)
召诰	(225)
洛诰	(231)
多士	(238)
无逸	(244)
君奭	(249)
多方	(256)
立政	(262)
顾命	(268)
吕刑	(279)
文侯之命	(290)
费誓	(293)
秦誓	(296)
大禹谟	(299)
五子之歌	(307)
胤征	(311)
仲虺之诰	(314)
汤诰	(318)
伊训	(322)
太甲上	(327)
太甲中	(330)
太甲下	(332)
咸有一德	(335)
说命上	(339)

说命中	(342)
说命下	(345)
泰誓上	(348)
泰誓中	(352)
泰誓下	(355)
武成	(358)
旅獒	(363)
微子之命	(366)
蔡仲之命	(368)
周官	(371)
君陈	(375)
毕命	(378)
君牙	(382)
冏命	(385)
尚书序	(388)
参考文献	(396)

《尚书》通说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部书:传世文献数它最早;传播历程中的大起大落很难找到第二部书可以和它相比拟;中国经学史上“今、古文之争”从它开始“且最纠纷难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作为封建时代政治教科书它又长期指引着后世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这部书就是《尚书》。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断限》篇中有一个说法: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

“七经”是指儒家学派的七部经典,在刘知几生活的初唐时期,被尊奉为“经”的儒家著作已从汉魏“五经”扩展到七种,故称为“七经”;而“百氏”则是指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及其以后思想家们的著作。事实上,刘知几在这里是用“七经”和“百氏”来总括古代学术的。由于《尚书》是一切学术的渊薮所在,正确的学习次序应该是,先把《尚书》读熟,再读其他著作。平心而论,刘知几的这个说法很有见地,《尚书》以其独特的地位而受到人们的尊崇。

在当今国人的书架上,看不到《尚书》的踪影已算不上什么怪事,然而明日黄花并不能掩盖其昔日的辉煌,回顾传统文化是绕不过《尚书》的。那么《尚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研读之前应

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如何来研读它？这是这篇“通说”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 风雨历程传播路

（一）《尚书》及其在早期的传播

《尚书》本来叫做“《书》”，“尚”字是后人给加上去的。起初，它只是一部历史著作，在阴差阳错中与儒家学派发生关系后，这部著作被指认为“儒家经典”。出道之初的这些小事，是读者首先应该了解的东西。

关于《尚书》的来源，历史典籍中有不同的记录。《汉书·五行志》上篇有这样的记载：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虞[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这就是说，西汉时代刘歆把《尚书》，至少其中《洪范》篇的起源，与“雒书”的神话联系到了一起。这种说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尚书》类”的小序中，班氏也说：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班固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尚书》起源于“雒书”；其二是说，《尚书》是由孔子编纂的，孔子还为百篇《尚书》作了序言。

《尚书》直接来源于“雒书”，这是《尚书》起源问题上的一家之言，这种说法在古代中国很是流行了一阵子，然而用今天的眼光

看,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河图”、“雒书”的来头太玄乎了:首先它们出现的时间在古代传说中就不一致:有说帝尧在位的时候,有说在周文王或者周公的时候——这时间上的不一致,本身就表明古人在这则传说上的犹豫不决——有青龙和神龟分别从黄河和洛水中浮现出来,献上了神图 and 天书,这神图就是“河图”,这天书就是“雒书”。至于其内容是什么,古书中的说法更是不同。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大家都在胡编乱造罢了。把这种神话或曰鬼话当做《尚书》的来源,自然难以让人口服心服,于是比较平实的说法也开始流行起来。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小序中,班固写道: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史官有明确的分工,言与事是分开记载的,《尚书》是古代史官记言的成果。由于《礼记·玉藻》篇的记载与此正好相反,“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所以有人对班固的上述说法也提出了异议,认为古代史官如此明确的分工不可能存在,那么《尚书》来源于史官所记的说法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我们认为,“言”与“事”严格分记,这一说法固然令人生疑,但说《尚书》是古代史官记言的结果,这话基本上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至少其中绝大部分篇章是这样来的。

我们的先民早就注意到历史经验对于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这是艰辛生活压迫的结果。周公说:“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尚书·无逸》)训告、教诲的内容,不外乎生产、生活经验。按照功能派文化人类学的解释,“讲故事”是原始先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闲暇时节,同一氏族的男女老幼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长者的“神侃”。这是原始时代道德教育、技能教育、生存本领传授的基本形式之一。对于原始先民来

讲,这种事情决非闲来无事的高雅消遣,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一件大事。通过历史的积淀作用,社会逐渐形成了注重历史经验的传统,于是讲史的人很早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细致,一些讲史者又多了一份工作——记录本部落发生的大事,或者酋长们的嘉言善语。后世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上古事务,于是把这些讲史兼录史的人称为“史官”。再到后来,他们便真的成为一种职官了。由于记录史事是史官的基本职责,所以许慎把“史”字解释为“记事者也”。商周时代的史官,有一部分人被称为“作册”,这个名称在武丁卜辞中已经出现。“作”字在甲骨、金文中均写做“乍”。“作册”就是书写、编辑和掌握典册的人,名字起得十分贴切。在那个文化事业尚欠发达、书籍出现未久的时代里,作册以及其他史官记录下来的材料显得弥足珍贵,自然受到社会的重视而被珍藏起来。在《多士》篇中,周公就曾告诫殷遗民说: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殷人“有册有典”,史书有明文记载。从甲骨文的字形上看,“册”字像用竹木简牍编组成册的形状,相参差的竖笔是一支支竹简,连贯各简的横笔是编册用的绳子。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五帝之书”云云不一定可信,但许慎也清楚“典”指的是书籍。“典”、“册”二字的出现,是商代已经出现书籍的有力佐证。

随着社会文明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要求扩大历史记录的范围,目的在于惩恶劝善,训示未来。一来二去,“君举必书”成为一种制度。历史记载丰富起来后,一部分材料由于种种原因被人带出宫廷而流入社会,从而成为《尚书》的源头。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修订,这就有了《尚书》各篇的写定成书。在我们看来,《尚书》中的主要篇什——周

初诸诰以及《顾命》、《吕刑》、《费誓》、《秦誓》等等，差不多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认为，《尚书》主要来源于上古时代史官们记录加工的说法大体上是可信的。刘知几写道：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音 mó）、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①。

这是一个史学评论家从体例方面提出的批评，我们姑且不去管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上面列出名目的这几篇之外，其余篇章确实是一些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按照传统说法，这些都是“记言”的材料，属于记言体史书。它们所录下的，全是些前贤先哲、王公大人的嘉言善语，一些富有启迪教育意义的材料。

《尚书纬》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这就是孔子“删《书》”说，并且指出，足本《尚书》应该是 102 篇：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②。

孔子“删《书》”、完整《尚书》有“百二篇”，这是经学时代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但黄帝玄孙帝魁是谁，孔子从哪里求到了这些书，谁也说不清楚。随着纬书地位的跌落，这个说法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尽管经学家们对此笃信不疑，但以史学的眼光看，这种说法事实上也是靠不住的。

从早期的历史记载来看，《尚书》是一个后起的名字。起初只叫做《书》，前面冠一“尚”字是后来才有的事情。《论语》、《左传》

① 《史通·六家》

② 《尚书正义序》孔疏引郑玄《书论》

等早期文献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论语·述而篇》记载说：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是用当时中原地区通行的语言来读《诗》、《书》的。这里所谓的《诗》与《书》，就是今天所说的《诗经》和《尚书》。在《论语·为政》篇里，有人问孔子，为什么您不去从政呢？孔子回答说：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几句话是《尚书》的逸文，后来被《伪古文尚书》收进了《君陈》篇。这里所标出的，也只是一个“《书》”字。

《左传》反复征引《尚书》的材料，或为“《书》曰”，或直接引出篇名，没有一次用“《尚书》曰”的。例如《襄公十一年》记录晋国大夫魏绛的话说：

《书》曰：“居安思危。”

《襄公十三年》引用《尚书·吕刑》篇的话说：

《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襄公二十三年》引用《康诰》中的话说：

故《书》曰：“惟命不于常。”

这些都直接标明引自于《书》。《左传》中也有标出具体篇名的，例如《僖公三十三年》记录晋国大夫臼季的话说：

《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昭公二十四年》记载王室大夫苾弘的话：

《大(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书》曰”也罢，标出篇名也罢，就是没有出现《尚书》这个名称。这个名称不但《论语》与《左传》中没有，先秦时期的其他典籍

中也没有这个名称。只有《墨子·明鬼下篇》的一段话稍有例外。这是一篇记录墨家学派鬼神观的历史文献。墨子认为历代都有鬼神存在,在征引了《夏书·禹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甘誓》之后,墨子总结道:

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

这是先秦典籍中关于“尚书”名称唯一的一次例外,对此清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江声、简朝亮等人据此认为,《尚书》这个名称是墨子最先使用的。但考据大家王念孙则明确指出:“‘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其次则商、周之书也。”后来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就是按照王念孙的说法,直接将“尚书”改为“尚者”^①。如果王、孙二人的说法不误,《书》前缀一“尚”字在先秦典籍中唯一的一次露面也得一笔勾销。退一万步讲,即便江声、简朝亮等人说法成立,“《尚书》”这个名称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但也仅仅闪现了一下而已,并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先秦时代通行的称呼是《书》,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尚书》”这个名称流行起来是西汉后期的事情。东汉末年郑玄提出另外一种说法:

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②

把《尚书》的命名与孔子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说法。此后出现的《伪古文尚书》不同意这种说法,它在序言中指出:

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以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① 《墨子间诂》是清代校勘、整理、注释《墨子》用力最勤、最为精当的一部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于《墨子》收录的就是这部著作。

^② 郑玄的说法见于《尚书正义序》孔疏所引。